

目 录

导言	1
一、史前史与传说时代	1
1. 古人类的起源	1
2. 石器时代	5
3. 史前文化的各种类型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	7
4. 炎帝、黄帝与传说时代	12
二、夏与商 ——历史时期的开端	18
5. 世界文明史上的中华文明	18
6. 探索中的夏文化	21
7. 从“大同”到“小康”	25
8. 商的起源与盘庚迁殷	28
9. 青铜时代	32
10. 商文明：甲骨文，宗教观念，科学	35
三、西周与春秋 ——Feudalism 时代	39
11. 周的起源与周朝的建立	39
12. 周公“制礼作乐”	42
13. “封邦建国”与宗法制度	45
14. 农村公社与井田	48

15. 春秋时代的列国争霸	51
16. 步入铁器时代	54
17. 老子与孔子	56

四、从战国到秦

——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建立	62
18. 各国的变法	62
19. 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时代	65
20. 秦的大一统及其地理基础	72
21. 秦始皇:皇帝与中央集权体制	75
22. 秦始皇陵与“兵马俑”	78
23. 徐福东渡之谜	81

五、西汉与东汉

——帝国规制的完备化	84
24. 大一统帝国的重建	84
25. 黄老思想与文景之治	87
26. 汉武帝: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化	90
27.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93
28. 王莽托古改制	97
29. 光武中兴	100
30. 清议与太学生运动	103
31. The silk road ——丝绸之路	106
32. 小农经济的发展	111
33. 科学技术新成就	116

六、三国与两晋

——统一王朝消失的时代	120
34. 从东汉末的割据到三国鼎立	120
35. 曹操与诸葛亮	124
36. 西晋:从“禅让”故事到“八王之乱”	128
37. 东晋:北伐与偏安	132
38. 魏晋风度与玄学	134

七、北朝与南朝

——走向再统一	139
39.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胡互化	139
40. 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的改革与汉化	143
41. 均田制与府兵制	147
42. 门阀政治	151
43. 艺术与科学	155

八、从隋到盛唐

——统一王朝的再建	161
44. 隋的统一与创制	161
45. 隋的“国富”与“国祚短促”	165
46.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171
47. 从武则天到唐玄宗	176
48. 盛唐气象	181
49. 佛教的兴盛	186
50. 长安：东西方文明的交汇	191

九、从唐的衰落到五代十国的割据

51. 由盛转衰的各个侧面	199
52. 安史之乱与全盛时代的消失	203
53. 藩镇割据	
——刘晏、杨炎的财政改革	206
54. 宦官与党争	210
55. 唐朝的分裂	213
56. 五代更迭，十国割据	217
57. 从柴荣改革到赵匡胤统一	222

十、北宋

——划时代的新阶段	226
58. 北宋的官僚政治	226
59. 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	231
60. “田制不立”与井田限田论	237
61. 传统农业的新发展	24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62. 巅峰状态的科学成就	245
63. “商业革命”面面观	250
64. 契丹的兴起与辽的二元化体制	256
65. 党项羌与西夏	260
66. 宋对辽、西夏的妥协	263
67. 女真的兴起与辽的灭亡	266
十一、南宋与金的对峙时期	269
68. “靖康耻”与岳飞抗金	269
69. 金朝统治下的北中国	275
70. 举棋不定的和与战	278
71. 经济重心南移的最终完成	281
72. 朱熹新儒学与浙东学派	286
十二、元	
——蒙古建立的王朝	291
73. 蒙古的兴起与成吉思汗	291
74. 混一亚欧的大蒙古国	295
75. 蒙古对中国的统治	
——元朝	298
76. 劝课农桑与“棉花革命”	303
77. 富有特色的工商业	308
78. 对外交往的扩大	311
79. 郭守敬与关汉卿	316
十三、明	
——中华文明的余辉	322
80. 朱元璋：从游方僧到开国皇帝	322
81. “胡蓝之狱”与皇权的强化	327
82. 航海史上的壮举	
——郑和下西洋	331
83. 海上走私贸易与倭寇	336
84. 商品经济的高水平发展	341
85. “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	346
86. 耶稣会士与早期“西学东渐”	351

87. 正统思想与异端思想	357
88. 张居正与万历中兴	361
89. 从东林到复社	365
90. 崇祯: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371

十四、清

——末代王朝的兴与衰	376
91. 清军入关与南明抗清运动	376
92. 康熙之治	380
93. 雍正:“为治之道在于务实”	386
94. 八旗,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	390
95. 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394
96. “夕阳无限好” ——康雍乾盛世	398
97. 文化专制与文字狱	403
98. 乾嘉学派	407
99. 从海禁到闭关	412
100. 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	417

主要参考书目	423
附录 历代帝王建元简表	426

后记	442
第二版后记	444
第三版后记	445

导 言

什么是历史？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给历史下定义，就好比给文化下定义，可以有五花八门的说法。

不妨看看大师们是如何说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我本人是经常意识到有必要降低胜利者宣传的重要性。”确实，以往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官修史书，几乎难以摆脱“胜利者的宣传”的色彩，要消除这种色彩并非易事。汤因比的警示是鞭辟入里的，但太过于情绪化，未免失之偏颇。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这种说法，与荷兰历史学家盖尔(Pieter Geyl)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都极富机智与精辟的思辨意味。卡尔如此解释他的观点：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此话言之有理，但作为历史的定义，似乎不能令人满意。

看来还得求助于学究式的典籍。《大英百科全书》(1980年版)对“历史”作如此解说：“‘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指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情进行的研究和描述。”这个定义说明了历史和历史学的联系与区别。

在古希腊文中，“历史”这个词的最初的含义是“调查与研究”，后来引申为“作为询问结果而获取的知识”。显然这是上述定义中的第二含义。比利时历史学家皮朗(Henri Pirenne)说：“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

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这句话把历史的双重含义包容在一起，“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指的是历史自身，而对“人类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发展”的描述与研究，便是历史学。

这些明白浅显的道理，到了“后现代”的历史学家那里，就变得复杂多了。因为他们不满足于浅表层次的理解。

当代美国学者凯利(Donald R. Kelley)在《多面的历史》(Faces of History)一书中说:历史作为一个术语和概念,在欧洲人看来,是希腊人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在有文字之前(Ante Litteram)就已存在历史实践,我们进入了各种观念诠释和利益互相冲突的危险地带。困难产生于“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他接着指出:历史的时空是无限的。那么,历史探询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另外,丰富的形形色色的人类经验为历史学家从事职业提供了材料,用泰伦斯(Terence)的话来说,对于人类历史学家而言,“没有什么陌生的”。此外,似乎存在着源自人类知觉的视野结构的传统二元论,即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明显区别——一方面处于生活中心的家庭,人际关系和家庭经济,另一方面则是集市和广场的世界,法律的世界和政治的世界,乃至战争的世界。因此,历史既涵盖了权力的实用主义的关注,也包含了对趣闻轶事的兴趣——从要事到琐事、从高贵的(或低劣的)政治到低下的(或高贵的)文化。这样,历史的兴趣涵盖摇篮到坟墓,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从家庭生活一直扩展到探险和殖民可及之处,局限只存在于后发之中——材料的可理解性以及历史学家的想像力之中。

德国学者耶格尔(Friedrich Jaeger)在《德国历史中的记忆文化》(The Memory Culture History of the Germany)中指出,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历史”这个意义构造物具有人的时间意识的双重意向延伸,一是经历和期待的延伸,一是保留和要求的延伸。通过历史的意义形成的心理实践,即历史的叙述,过去就获得了向未来迈进的当前历史的这个特性。只有当叙述把在过去形成的体验这样展现出来,使之在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关联中与当前结合在一起时,它才是历史的,才能通过对过去的体验的解说,实现时间定向的特殊功能。经过这样的历史,传统被传授下来,或者继续发生效力,或者受到批判。

当代西方学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重新思考,并非故作深沉,恰恰相反,它是有感而发的,反映了近年来史学理论的前沿探索,对于我们或

许不无启迪。

在我们中国,历史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科,可以说自从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了历史学。殷墟甲骨文中的“史”字,其字形仿佛人的手在握笔记事。这个“史”,就是商朝专门掌管记事的官员,即所谓史官。以后的内史和外史、左史和右史,都是掌管记事的史官。正如《礼记·玉藻》所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官们就这样为后人留下了历史记录或历史著作。孔子说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本意就是说他一生只整理历史而不创作,《诗》、《书》、《礼》、《乐》、《易》、《春秋》,便是孔子整理历史的产物,也是孔门讲学的教材。其中最具历史意味的当首推《春秋》,它是孔子依据当时鲁国史官的编年史书,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一部春秋时代的史籍,成为后世编年史的滥觞。当《春秋》由“史”升格为“经”以后,又派生出解释《春秋》的“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大大丰富了这部春秋时代编年史的内涵。

西汉时司马迁撰写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出现后,中国的历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逐渐成为显学,蔚为大观。从此连绵不绝,留下了号称“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其规模之宏大,品种之丰富,卷帙之浩繁,衔接之紧密,在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每一个中国人应该为此而感到庆幸和自豪。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当代中国,历史学受到冷落,社会上出现了轻视与鄙薄历史的风气。在“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中学教育领域,历史久已成为一门不被重视的课程。大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开设历史课程的系科寥若晨星。这与半个世纪之前,中国通史是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难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就可以不必学习历史了?非也。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政府官员和各类媒体中缺乏历史素养的奇谈怪论比比皆是,已经成为有识之士无法容忍的“公害”。

例如,一家大报,竟然刊文堂而皇之误导读者:北宋的徽宗和钦宗死于“漠北”。实在令人惊诧莫名!徽、钦二帝的死地叫做五国城,就是现今黑龙江的依兰县,与“漠北”(蒙古)风马牛不相及。

例如,近年来某电视台播放的关于清朝帝王的电视剧,自诩为正剧,并非戏说。但是,缺乏历史常识的错误几乎俯拾即是。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孝庄皇太后经常自称“我孝庄”如何如何,令人啼笑皆非。众所周知,“孝庄文皇后”是她死后的谥号,这个谥号的全称是:孝庄仁宣

诚宪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她活着的时候,是决不可能知道自己死后的谥号是“孝庄”而把它当作自己的名字来叫,开口闭口“我孝庄”如何如何,荒唐至极。

例如,多年来上海有的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经常脱口而出一句似是而非的话语:上海开埠以后,从一个荒凉的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直至今日,为了纪念上海开埠 160 年(1843—2003 年),沪上大报又在鼓吹:160 年前的“渔村”如何一跃而为国际化大都市?据此,当然不必讥讽他们关于上海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但是说他们是想当然地以讹传讹是毫不为过的。160 年前的上海根本不是什么“渔村”!上海早在 700 多年前的元代,即 1291 年就已经建立了县城(上海县),经历明代的繁荣,到了清代中叶开埠以前,早已成为经济发达的商业中心城市,1843 年以前哪里还会是“渔村”呢?何况现今上海境内的松江早在唐代即已建立县城,嘉定则在宋代即已建立县城,青浦在明代也已建立县城,难道过了几百年统统倒退为“渔村”了?

再如,全国一些地方政府及企事业负责人,出于对历史的忽视或无知,已经或正在制造一起又一起“建设性破坏”,毫无顾忌地摧残文物古迹及近代优秀建筑。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说:“我们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文化遗存,正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一次性破坏,这种破坏与‘文革’中不一样,‘文革’时是当作‘坏’的东西恶狠狠地破坏,现在是当作‘旧’的东西,用新的、更美好的东西替代,是乐呵呵地破坏。”

这就是轻视历史所带来的恶果,或者说是一种惩罚。这种现象久已有之,于今为烈。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西方记者坦普勒(Robert K. Temple)的《中国——发现与发明之邦》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大意是,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ph Needham)的研究,解开了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未曾知晓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迷惘,当代世界文明是由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综合而成的。当 17 世纪西方传教士向中国皇帝敬献钟表时,中国人感到惊奇;殊不知最早发明机械表的正是中国人自己。欧洲的农业、造船、采油、多级火箭、大炮、降落伞、造酒、造纸、印刷、象棋、蒸气机原理、天文学、十进制数学、算盘等,都是文艺复兴以来从中国进口的。没有中国的造船技术、指南针和其他发明,欧洲 17 世纪以来的各种发明创造和产业革命都根本不可能产生,也不会有英国骑士时代和殖民帝国时代。

读了这一段出自西方人对中国历史与文明高度评价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自豪之余,难道不应该对自己历史知识的贫乏,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吗?

轻视历史,不仅意味着数典忘祖,而且意味着否定自身存在的价值。因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即将成为历史而载入史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创造历史。如果我们的后人也以轻视历史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个时代,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作出的艰苦卓绝的贡献,就将变得毫无意义。

凯利在《多面的历史》中说,历史学家最后所面临的是历史的目的地问题:研究往昔的益处何在?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这种问题的各种答案一直在不断出现。历史保存或铭记了那些重大事件和人物,尤其是民族传统中重大的事件和人物,因此它是谱系学的一种比喻形式的具体体现。与这种狭隘的关注主题相分离的是,历史需要一种说教功能作为特别的道德或政治教训资源。但是,更应强调的是,历史是一种自知的形式,或者说是探寻自知的形式,它不满意于狭隘的“满意”,并且不期待具体问题的答案。它是一种智慧形式,即是一种在时间上拓展人类视野并超越地方经验和注意力的一种形式。在这种程度上,历史将始终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话说得多么精彩!

确实,历史是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它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人类的现在和将来。历史给人以智慧,教人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深邃眼光去看待过去,看待现在,看待将来,而不被眼前方寸之地所局限,不至于成为鼠目寸光的庸碌之辈。只有深刻地认识过去,才能理解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才有助于选择一条正确前进的道路,才能展望美好的未来。历史并不是一些人眼中所谓“老古董”。历史是常学常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实在是意味深长的。



一、史前史与传说时代

1. 古人类的起源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几千年,但是,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即史前史,却非常漫长。

人类的起源是史前史首要的重大课题。人类是由一种古猿演变而成的。人类从古猿分化出来,大约经历了1000万年的时间。1000万年前,地球上有很多猿类;500万年前,有了人类家庭中原始人类的留世遗存。在古人类的考古史上,1000万年和500万年这两个基本分界之间的时期,人类始祖与猿分离,向原始人类演进。然而,这只是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推论,有关这一演进过程的实物证据十分罕见。

上个世纪,在非洲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距今约400万年到100万年,虽然还保留若干似猿的原始特征,但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向人类进化的趋势,它已能直立行走。

上个世纪发现的最早人类是“东非能人”。它是肯尼亚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1903—1972年)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瓦峡谷发现的。“东非能人”的体质形态比南方古猿显得进步,但比以后的直立人显得原始。它能两足直立行走,并能制作石器工具,因此被判定为最早的人类。

路易斯·利基出生于英国传教士家庭,从小就到非洲的肯尼亚,在内罗毕附近一个非洲人部落长大。有志于证明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科学假说的他,1931年在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瓦峡谷发现了古人类骨架,当时断定为非洲最早的人类。1959年,他的夫人玛丽·利基在奥杜瓦峡谷又发现了举世闻名的“津吉人”的头盖骨,它的年代距今约175万年。

这一发现不仅使利基夫妇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而且推进了古人类学和人类起源的研究。1978年,玛丽·利基在坦桑尼亚的腊妥利发现了距今约380万年到359万年的原始人脚印。利基夫妇的次子理查德·利基则于1972年发现了距今约180万年的直立人骨架;以后又发现了距今约160万年的直立人骨架和头盖骨。1994年,理查德的妻子米芙·利基在距今410万年的遗址中找到了最早的原始人的遗迹。利基家族为证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科学假说,付出了两代人的努力。

2002年,一支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中非国家乍得发现了距今700万年左右的最早的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图迈人”。根据专家的研究,“图迈人”明显地表现出原始人类和现代人类的双重特征:它的脑壳仍然像猿类,不过脸形短,牙齿尤其是犬齿比较小,类似现代人的牙齿。由此,专家们推论,它或许就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如所周知,中国境内发现的直立人是元谋人,还有蓝田人和北京人。虽然时间晚于非洲,但是科学界对于中国古人类是否起源于非洲,颇有争议。

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院士和吴新智院士,20世纪90年代在《人类学学报》发表一系列论文,探讨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国际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大约距今700万年以前的非洲,开始出现了人的系统和猿的系统的分离;大约在距今250万年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能人”;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人,它的化石在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

在中国的大地上,至今还没有发现“能人”的化石;所发现的最早人类属于直立人——即通常所说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及和县人等。当然,至今还有不少疑问,例如,一般认为元谋人的年代约为距今170万年,但也有人认为它的年代不会超过距今73万年。而近年来某些学者提出的“东方人”、“蝴蝶人”、“竹棚能人”、“中国古猿”等新名称,乃至倡导“云南是人类发源地”之类说法,是缺乏科学根据、难以成立的推论。

可以确定的是,大约距今20万年前,出现了“智人”。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同属于早期智人的,是中国的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许家窑人以及马坝人等。与欧洲的克鲁马努人同属于晚期智人的,是中国的柳江人、资阳人和山顶洞人等。晚期智人即通常所说的“现代人类”。此前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大都灭绝,只有晚期智人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形成了现代人类的三大人种：欧罗巴人种，尼格罗人种，蒙古人种。

关于“现代人类”的产生，国际人类学界有两个学派、两种理论，即“多区起源论”和“单一起源论”。

多区起源论认为，地球上各地区的现代人类是从各地区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的，当然也不否认，在各自的进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地区的人类基因交流。

单一起源论是近年来呼声很高的一种理论，它主要依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主张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称为现代人类起源的“夏娃理论”。简言之，目前地球上各个人种都是 20 万年前某一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这个非洲女性祖先就被称为“夏娃”。这种理论认为，“夏娃”的后代离开非洲，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等地，取代了当地原有的早期智人；而欧洲和亚洲的早期智人并非现代人类的祖先，它们与现代人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及其全球合作伙伴，2001 年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披露他们对 12000 条染色体的研究成果，在东亚人身上发现了 79000 年前非洲人特有的遗传标记。这一课题的负责人金力认为，这是目前支持“东亚人非洲起源说”的最有力的证据，它进一步表明来源于非洲的人群完全取代了原来居住在亚洲的古人类。他们推论，东亚人的祖先大约是在 6 万年前从非洲到达东南亚一带，然后向北迁移至中国。

对于上述理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1988 年美国《新闻周刊》把“夏娃理论”作为封面，引起轰动，成为该年度最畅销的一期。1993 年，“夏娃理论”作为最新研究成果，在日本专门举行了国际学术讨论会。但是，它也遭到西方一些学者的非议。他们指出，现代中国人和大洋洲人乃至欧洲人，都分别类似于本地区的古人类，而并不类似于非洲古人类。更重要的是，在地球的每个地区，都已经找到这个地区现代人类与该地区古人类之间的联系。

“夏娃理论”在中国也遭到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吴新智院士，他指出：在中国大地上，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现代人类，众多的出土化石表明，存在明显的连续进化，东亚的蒙古人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并非来自非洲。例如，蒙古人种在头骨形态上，从直立人到现代人都存在着矢状脊和印加骨，都表现出上面部低矮，鼻区扁塌，上颌颧突等性状；在牙齿形态上，都具有铲形门齿

与双铲形门齿,以及上颌门齿中断沟与下颌臼齿转向纹,还有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等特征。此外,从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与直立人及智人相对应)的发展过程来看,也存在着明显的前后连续性,根本没有出现过文化中断,根本不存在外来文化大规模取代当地原有文化的迹象。因此说非洲人取代了中国大地上的早期智人,成为中国人的祖先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当然,吴新智等学者也不否认人种之间存在互相交流的现象。从直立人开始的中国史前人类及其文化,是在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下自成一体地发展起来的,但也不完全排斥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人类基因交流及文化往来。因此,在中国的晚期智人的体质特征或石器文化上,都可以看到外来影响的证据。例如,中国南方的柳江和资阳等地发现的人类化石,它们的头部枕骨的发髻状构造,可能来源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山顶洞 102 号头骨的颧骨额蝶突的外侧面比较朝向外侧,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相似;中国古人类特有的扁平的面部也表现于欧洲的斯坦海姆人和阿拉戈人。所有这些现象,都可能是东西方人类基因及文化交流的结果。但这并不表明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是非洲人。

2002 年,中国科学家对柳江人年代进行重新测定,结果表明,柳江人生活在距今约 7 万~13 万年之间,而不是原先所认知的 3 万年。这意味着,具有解剖学上现代人特征的柳江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比人类学家原先所认知的更早地生活在华南地区。同时表明,中国的现代人类的起源不晚于非洲和西亚,这就显然不支持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美国《科学》杂志于 2001 年 5 月刊登由中国和外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论文宣称,通过基因研究得出结论,东亚人的祖先不是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而是来源于非洲的现代人,他们于 3.5 万~8.9 万年前,从非洲迁移到东亚地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认为,用基因研究结果推测人类进化过程,无论如何是间接的,而来自化石的证据是直接的。柳江人化石年代的测定,直接证明了在 7 万~13 万年前或更早,柳江人已经在华南地区生活了,不可能是在这之后才从非洲迁移而来。

在中国境内,几十个地点发现的包括直立人以及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证明中国古人类体质特征发展的连续性。可以说,中国人的主体部分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

“人类起源非洲说”日益面临“多区起源论”的挑战。科学的真相究

竟如何,人们仍将拭目以待。

2. 石器时代

考古学者按照人类使用工具的器质,把人类早期的历史区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

1836年丹麦学者C·汤姆森首先提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分期,奠定了史前考古学的基础。

1865年英国学者J·卢伯克又把石器时代区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1892年英国学者A·布朗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划分了一个过渡时期——中石器时代。

1877年意大利学者G·基耶里克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划分了一个过渡时期——铜石并用时代。

对于这种时代划分方法,中国古代学者早就有朴素的认识。东汉袁康撰写的《越绝书》,引用战国时代风胡子的话:“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斫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斫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当此之时(按:指风胡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作铁兵,威服三军”。这段话把传说的三皇时代作为石器时代,从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作为玉器时代,禹以后的夏商周三代作为铜器时代,春秋战国作为铁器时代。大量考古资料表明风胡子关于石器、玉器、铜器、铁器使用时代的看法是符合中国历史状况的。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中说:《越绝书》的这个分期法,正确地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经过的本质变化撮要出来,在历史现实中具有坚实的基础。

石器时代一般区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出现,生产工



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丁村人文化)